

遭遇美国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书名:现代文学

书 名: 遭遇美国

作 者: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版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1-1

ISBN 7-88050-475-3

中国分类法号:I27

定 价: 10.00元

遭遇美国（上）

刘索拉

刘索拉背景

生于北京，1978 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作曲，并于 80 年代初期发表成名小说《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等。1987 年进入北京作家协会成为合同作家，身兼作曲家、小说家、歌手多种身份，并曾应邀到世界各地艺术节演出。曾经为多部中国电影，电视剧、舞剧、戏剧作品等作曲。

1988 年初前往英国展开长达六年的创作及表演活动，1993 年起到美国发展。主要音乐作品有：摇滚歌剧《蓝天绿海》、音乐剧《梦游》、大型舞剧音乐《六月雪》、大型说唱音乐《碎琴》等，在美国与美国宝丽金 AXIOM 录制个人作品《蓝调在东方》。目前，她正在美国创作长篇小说、歌剧、人声器乐协奏音乐会及大型人声表演艺术戏剧等。曾参加在南韩举行的奥林匹克演出活动。

主要小说作品有：小说集《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等，近期主要小说作品有《混沌加哩咯愣》。

刘索拉录音——

其实，比起该读书的人，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我这个人这辈了唯一的优点是，我敢去试。

我第一次出国是 1987 年的时候，那时候美国新闻总署每年邀请一位作家到美国访问，我就到美国访问了。访问之后我又回到中国。再出国是我自己联系的。与我第一次出同相比，第二次出国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因为第一次的时候我是一个访问者，别人为你安排好了各种事情，所有人都对我特别热情。第二次我出国去的是英国，而且一般从中国到美国来而没有到过英国的人一定不知道什么是“殖民地”，在英国，作为一个外来人你会感到人种的不同，你不会感受到那么多复杂的层次。因此你会感受到很多压力，我也更加懂得香港人的感觉。英国是一个代表强大的欧洲文化的中心国家，不像美国，中国其实也是代表东方文化的一个中心国家，因此我到英国去，感到和英国人特别有话说，尤其是英国伦敦人、我感觉和北京人特别像，压力、压抑、层次感觉和北京人很像很像。但是如果你不是一个西方人们是你搞西方艺术，英国人就会歧视你，会首先给你划一个问号，比如我是搞西艺术的，他们会觉得你玩什么西方艺术，西方是他们的。他们有最大的权利来讲解西方。

也因为这个，全世界的人都认为英国人傲慢，但他们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他们要的是真东西。比如你说到莎士比亚，你就得给他说得地道了，别玩花的。英国人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的。这就有点像是老派的中同人搞中国文化有保守的一面，但是也有扎实的一面。

我到美国后的感觉就是完全的另外一个样子，美国是这样一个地方，他不会给你压力，不会说你不是真的，但是由于没有这个压力，这个国家就充斥了许多胡说八道。也就是说胡说八道在美国可以滥行。这里因为没有有一个标准，没有一个保守的标准、也没有一个应该有的标准，因此如果你没有方向，你就会很快地淹没在这里面，然后你自己也就变成一个胡说八道的人。

我之所以选择留在美国，是因为美国由于具有轻浮的一面，所以他的信息量特别大，无论好的或者是坏的，如果你自己有自己的准则，你就可以在

里面挑选。另外一个原因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大家都愿意试验，美国人相比之下就乐于参与你的各种试验，在美国你比较容易找到参与者，但是英国的情况就不同。

当年，我是靠一个音乐剧的制作邀请到英国工作的。我们当时的制作费用不错，日子也过得比较宽裕。我一到那里就开始作音乐了，一到那里每天晚上就和我的音乐家一起去喝酒，一喝就喝上一下午外加一晚上。我之所以找到这样的机会是一位英国的导演曾经到中国去听过我的《蓝天碧海》音乐剧，这之后，他就希望在英国排演我的歌剧。那时我特别幸运，我到英国去，一下子代理人什么的就全有了，那时的我是要去主演自己写的音乐。

那一年，我的歌剧已经确定在九月份要演出，所有的预算都已经打好了。当时，现在说来已经是世界闻名的《西贡小姐》音乐剧刚刚在筹备，那时它不像现在这么红，当时《西》剧的导演看了我在英国的 MTV 就想让我去，结果我的导演没有让我去，他当时问我“你是要自己的歌剧还是别人的歌剧”？听了这话，我就拒绝了《西贡小姐》。然后紧接着，九月份的时候《西贡小姐》就红火起来，我的歌剧就黄了，实在说，我的歌剧根本就是石沉大海。因此，在国外我学会了千万不要听什么好消息，如果有人说要和你签一个合同，但是签约的前一分钟，这个合同都会变。

在这之后，当我的生活即将发生困难的时候，我马上做了我的第二个音乐剧。我在做这个歌剧时的预算比前一个要小得多，钱少得多，非常穷。这种时候，我不仅变成了编导和演唱者，而且还身兼作曲、舞台设计和设计服装，什么都干。当时，我们的车子上拉着我们的所有道具，车子一到达演出地点，就自己卸道具。而且是车开到哪里就演出到哪里。

在国外干音乐这行其实是有单独渠道的，最重要的是要有能力得到有关的基金，一些在美国或者海外能够持续自己专业的音乐家，几乎都是这样生存下来的。因为得到了基金就能让音乐家生活下去，这里或者那里给你一点钱，你的事情就成了。

刚刚到海外来的时候我还不够成熟，那时我总是做完一个项目后再做一个。我现在是同时做十个项目，这样就成熟了。因为。十个项目中如果有两个行了，就可以了。

在美国，我每天中午 12 点或者一点钟起床，早上我睡觉，我一般是从早上四五点钟开始睡觉，那时我不接任何电话，这样我可以利用整个晚上的时间，没有人来打扰你。当然这样做也有很多不方便，比如排练的日子里我就得正常一点。我的生活中老得转时间，比如说要演出了，我飞到演出地点，可能的情况是早上飞晚上就要演出，第二天早上又有采访，时间就得转过来。干这一行，你就得干脆下定决心，这一辈子就这么活了，这样也就没有什么可想的了，也就习惯了。

这种时候，你的家庭生活就得照你的生活方式了。我必须找到一个人能够适应我的这种生活，他得知道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活的。多少年来我曾经试着放弃过我的这种状态，但是它是不可能的。一直以来，我想做一个生活“正常”的女人，但是我发现我本性就是适合做音乐，就是这么回事。我没有办法。

你说我能怎么办？就是这么个破人。

面临这种现实，你会很不高兴，人一不高兴，迁就会死得快。

我在英国的时候就曾经到美国来和搞音乐的黑人住过，我专门就是为了

采风，我住在孟非斯，就是美国黑人蓝调的大本营。

我特别喜欢黑人的蓝调音乐，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真实，它不仅有忧愁的东西，而且还有很多高兴的东西和反叛的东西，蓝调后期又出现了许多“反蓝调”。相比之下，美国音乐中的百老汇歌舞剧其实是最没有意思的东西。当年我从英国到韩国去参加奥林匹克的演出，如果我是从中国直接到那里去演出的话，我会感觉特别好，因为那里有两个大乐队为我伴奏，那就是百老汇的规模，但是我当时的感觉是实在太虚假了。感觉特别不好。我在那里是演唱自己的作品，代表中国歌手，但是在那个环境里，我感觉自己不像是一个做音乐的，而是在做一个大型的模特表演之类的，很表面化。那时候我在英国整天和一个庞克乐队演出，然后转回头来去了韩国，每天有人来审查你的衣服。参加我那场演出的人全都是欧美 50 年前很红的人，或者是在亚洲很红但是在美国没有人买帐的电影明星，所以整个是个时装秀，当时的场面把韩国的人带得很疯狂，但是当我把演出照片拿回去给我的英国朋友们看时，他们要我“最好把它们藏起来”。

我说过我是一个比较敢试的人，其实这也是造成我生活不稳定的因素。很多人那里的真理到我这里都是我试出来的，我搞文学、我搞音乐、我还画画。当初我要搞文学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都反对。我刚从音乐学院毕业后马上就搞流行音乐，也是所有人都反对，我马上又唱上了，没有人支持我。在选择方面，我其实是一个糊涂人，我不是一个明白人，到现在，很多生活中的基本常识我不懂，所以我要问自己的女朋友，我常常甚至要问为人处世、家庭中的各种琐事这类事情。我其实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适合搞音乐，我不知道结果会好或者不好，我说不干了就不干了，只要是我想干的事情我就是想干，哪怕人人都说不好我就是想干。一切都需要看结果，结果好的就算我幸运。我性格中就是喜欢这样的刺激，如果有朋友说咱们上当海盗，如果当时我觉得刺激，我就去当。这其实挺危险的，当完海盗之后才会坐下来想：唉，刚才我怎么当海盗去了？所以我这一辈子中做过许多错事，我会一直做到底。

一直以来，我脑子里面感觉到我每天都在放弃一些东西，每天都在放弃，本来作为女人天生我们该有很多东西，但是对于我而言，我好像不停地在扔东西，不停地在放弃，很多家里灌输的东西都扔了，经过这种磨练，你开始对自己目前的处境越来越高兴。从整个从中国到海外的人来讲，我的经济状况一直算是比较幸运的，我有时会到了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但是我会一直有朋友帮助我，或者每次当我最困窘的时候，忽然就从天上掉下一个合同，又把我救了。我常常会遇到这种事情，但是你一直要做好一败涂地的打算，我的很多哥们因此常常跟我说，“不行就到我这里来住”。我的朋友特别多，很多朋友让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托着我、支持我，觉得我做的事特别难。目前，我知道像我这么干的人只有我一人。我非常难，我为自己制定的方向也决定了我很难。因为如果你要做一个作曲家，你就是写曲子，然后演出你就是靠基金；如果我一直想当一个流行歌手倒还不是那么难，前几年我在欧洲拒绝了很多当流行歌手的建议，他们会说你长相比较年轻，你应该穿什么样的服装、和一个什么样的乐队演出，需要包装一下。我有不同的代理人，而且我是那种代理人一看就想包装的人。这么多年来，很多代理人一看到我就说，你是一个东方人，你自己又会写曲子，长得又不错，加上你自己在中国的名气之类的，你太容易被包装了。但是这种包装实际上

非常可怕，那么我还得有胆量去拒绝这种包装。你如果个性不强的话就会被包装，这种包装你试过一次就够了。比如说他们会让你唱你根本不想唱的歌，我曾经试过这种包装，我想看看到底会怎么样，但是我不得不拒绝。那时候我还在英国，我不往下做了，因为我的东西这么出来后已经不是我的了。比如他们会让你做一种状态，而你身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流行歌手就是有要服从的因素，如果要包装的话，我写出来的歌也就是得要别人来改编一下。我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不一样，因为我一直处于一个很不明显的状态，又在这里，又不在这里。我是在探索一种新领域，其实学古典音乐的人和学流行音乐的人都不会做这样的探索。

在海外，我已经有各种经验了。一个唱片完全被做出来了，但是在没有上市之前，你必须想到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情都可以把这张唱片销毁。我在英国的时候就经受过这种事情，我的唱片做出来了，MTV 也已经做好了，但是这时候，公司倒台了。你什么东西也拿不到，这个东西就没有了，除非你找到一个非常好的经纪人，除非你自己就是一个商人。在同外，很多音乐人把自己的房卖了，就是为了准备自己的下一张唱片，然后再把唱片卖了，再把钱拿回来。拿得回来就拿回来了，拿不回来就算是赌完了，就死了。完全是赌博。

我现在已经对生活中突然出现困窘的状态快麻木了，其实我也必须麻木。我不知道我算是搞流行音乐还是古典音乐，音乐是很细地分档的，但是我找不到我自己的档。我把自己的处境放在做一个摇摆不定的地方。有一次一个记者采访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曾经经历过像国王一样，很多人在外面排队给我献花。那时候我在做一个商业演出，得到很多钱，一天换四次衣服，有两个女人跟着，只要我一站起来，她们就会把你的衣脚烫平；但是我也经历过完全掉在一个杄晃里，和几个音乐家一起，排练之后每人出一块钱来买一个三明治，晚上再照同样的办法来吃，冻得要死，曾经有记者要我谈一下中国的音乐政治压力，但是我告诉他们：西方的压力更大，巨大的经济原因会使得一个演出说完就完。

现在我出一个唱片，会有自己的提成，我还可以向我的出版社预支费用，最少大约也可以得到几万左右。但是你要交钱给你的代理人、给你的律师，中间总是会有人来一道道地拿钱。我们的所有合同都是要给律师看过的，这也是要给钱的。如果制作费很高，我会打出一个预算给唱片公司，同时也等于我欠唱片公司的钱了。未来，等到我有钱了，交钱的时候各种事情都要交钱，甚至于我的曲子是有版权保障的。我和一家公司签了这方面的合同，里面涉及到很多法律问题，即便未来是我把自己的东西拿给别人，我也要付赔偿费的。这些欠下来的钱今后是要从我自己的帐里一笔一笔地还给他们，直到还清才才可以自己提成。所以，英国的一个报纸就曾经报导过一个很有名的摇滚乐队，他们说：不要看我们的乐队拿到一笔合同就是二十万，但是到最后，我们常常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没有。我的状况也是，好像我已经有一个很大的出版商在身后了，但是我其实已经被转进一个庞大的商业的轴里面去了，所有的东西他们付出了，最后都是要拿回去的。

这整个是一个非常刺激的赌博。

我现在最重要的是不愿意放弃在美国做事情所能感受到的刺激，感觉中这里虽然苦，但是刺激性大。回国这件事情对我说来相对比较容易，我是音乐学院出来的，又有点小“臭名”，找个什么工作并不难，最起码能找到

事情做，而且会有人对你在乎什么感兴趣，可是我觉得这样不够刺激。在这里谁都不知道你，然后你一个在这里“刨坑”，大天疯了一样上窜下跳地着急。

在音乐上，我已经做了十年的采风，我一直主要做歌手，除了音乐学院教给我之外，我等于自己给自己上了一课。这十年的时间里我把摇滚乐和黑人的蓝调、爵士之类的东西都学了十年。我去感受它们，现在我已经该开始我自己的创作了。我不再是歌手了，我要把我过去学到的学院派的东西和我自己在采风中学到的东西进行整理，创作出我自己的音乐来。

我现在只能想我的音乐未来的展望是怎样的，因为一个人一辈子可能的选择实在太多了，但是我以我现在这个岁数已经没有能力说我展望什么了，我只能说我已经是这样了，我过去所有的学习和思考，我只能做这些事情了，如果别人接受了，就算我幸运，如果别人不接受，就算我倒霉。因为，我来不及了。

与此同时，我在中文的文学写作方面正在写一个长篇，但是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我其实没有怎么考虑我的音乐或者小说是不是可以赚钱，在国内的时候我写小说赚了一些钱，但是我搞音乐就完全没有钱，我也想不到我的音乐未来会赚钱，当年在国内我就是同时在干这两件事情。在国内的时候，我周围的朋友都非说我在文学上是非常有才能的，但是在音乐上却非常没有才能。其实对这种事情我也没有什么办法，我当年写《你别无选择》的时候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标题，说的就是我自己，我其实想放弃音乐很久了，有时感觉到自己不自信，但是我知道我的直觉在带着我走，我在本能中是干音乐的，其实。

因为我有很多机会放弃音乐，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我在国外开始搞音乐于是从头开始的，我做了那么多年庞克歌手，把自己先扔到屎坑里去受罪，但是我还是都忍下来了，这就很明白地说明我就是个搞音乐的，没有什么可以停止我不做音乐，这也是一种别无选择。我知道我没有给自己选择一个特别容易成功的路，我也没有为自己选择特别高的路，我发现，我走到哪里去说自己是一个作家，人家就都会很尊重你，但是如果你跟别人说你是一个流行歌手，人家就斜着眼睛看你，在英国和美国，我一直是以一个流行歌手的姿态去进入别人的，以一个“就是来和你们混在一起”的身份进入别人的领域，在很多人眼里我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但是这其实是我的一个动力。我不知道这条道路走下去是光明，还是黑暗。

多少年来我对于西方音乐的观察一直在进行之中。总的来说，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对音乐中的流派包括摇滚，爵士、蓝调等的采风工作已经完成。1995年4、5月份，我在纽约举办了两场个人作品音乐会，头一场是我的新作品《中国拼贴》。五月份的就是我相对出名的作品《蓝调在东方》。有关这两场音乐会，西方社会有许多评价。其中《纽约时报》的评价说：“刘索拉表现了同一种传统中的异变。在《中国拼贴》里她有时粗声大叫，有时蜂样低吟，时而像鸟时而像古猿时而像笙时而像琵琶……”

1995年下半年，我还带着我的《中国拼贴》到荷兰去参加亚洲音乐节。

现在我主要的精力是在搞音乐，我想未来的时候我会拿音乐来养我的文学。活到现在，尤其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我根本没有什么退路。我有些搞艺术的朋友想做点买卖什么的，我做不了买卖，我把自己搞得一塌糊涂。即便我收入好的时候我也不会管理自己的财务。如果说收入，我们不是一个固定

收入者，今天交得起房租就过下去，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别人在我的情况下，会储蓄得非常好了，而我不行。对于我来说，钱一多了我会自己出钱排练、弄东西，把钱放到工作里去了，或者我会为了下一步的工作买些机器，或者付给录音棚再做一些新的实验。

我知道没钱的滋味特难受，但是我喜欢玩音乐的这种感觉，这有点像吸毒，有瘾。你就是觉得好玩，就是要把钱往里扔。所以我做唱片的时候，预算都开得特别高，给音乐家的钱也高，在音乐上我要求得很精确，如果我认为这段音乐不行，我马上就加录音，加棚，我不凑合。如果这位音乐家来试过之后我认为不行，明天我就换音乐家。我请的人都是在美国爵士音乐里上榜的人，我说过我要请就请最好的。我也不知道我的东西我于吗要把它做成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办，一步一步来吧。总是有事情会发生。

我早想过自己“最坏的状况”，不过会是什么都没有了，打一个小包走。

唯有一点，那就是我对我的音乐绝对保持诚实，这样，我不会让自己的年龄来阻止音乐。

陈燕妮思绪

我其实是在八年前在北京召开的“青年创作会议”上和她认识的。这个会议因为网罗了当年文学界各色人等而在当时相当出名，在当年的会议场所、北京的京丰宾馆内，我住的房间恰和她的房间紧邻，她不常到会，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忙什么。传闻中，她偶尔来时就会常常和同屋而住的写小说女孩偷偷在房间内抽烟。

那时我的年纪实在不大，很羡慕她当时就能流露出来的不羁，同时觉得自己因为相对循规蹈矩而委琐。

有一天，好不容易在宾馆外的大空场上见到她，觉得她很漂亮。她当年的确出名，而且漂亮。

后来的几年中，一些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一直想撮合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说是因为我们太过相像的缘故。

后来我们分头出国了。

再后来，在美国，偶然地我在所工作的电视台中看到香港为她和崔健合拍的一部纪录片，那时候，她正好剃了个光头，吓人一跳。

直到此次采访，时隔八年，坐在她借住的纽约下城东村附近的公寓里时，看着她已经不再那么年轻、更走向自然和成熟，她的冰箱里有酒，面对年龄，感慨很多也自如很多。

我们都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们了，我们比过去接近太多，相信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很想跟她说八年以来我对于她的许多念头，但是忍了一忍，终于没说。

我们脸色平静，眼睛闪光。采访过她之后又听了她的《蓝调在东方》，给我一震，很新感觉。果真是她自己唱，果真她的搭配歌手也奇妙，果真整个曲子都奇妙。听完之后，我把这磁带珍惜地送给一个常常给我很多帮助的朋友，那时，这位朋友正在迷恋“YANNI”的乐曲，我说“听听这个吧，是个奇妙的东西”。

大陆作家孔捷生曾经在一篇采访刘索拉的文章中感慨地说：中国大陆艺术家这20年间飘流到海外来的颇有一些，能始终不渝地坚持其本行创作的已不多，这是海外的生存环境所决定的。在我看来，北岛是一个，他的诗写得

更加精粹、更冷峻、意境更深远。索拉是另一个，她的小说写得更挥洒自如，举重若轻。我读她的新作《混沌加哩格楞》、《蓝调之绿》都不觉得她这是在写小说。人家还在想，索拉已经做了，就是这么回事。

她不化妆，素面朝天，说起话来有奇妙手势和姿势。

看着她，好像看一个好看的过程。

李斌

李斌背景

祖籍上海，从小在江西生长，自 1969 年起在赣南待了八年，后随父母回到上海。1982 年以江西省高考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上海复旦大学英语系，就学期间曾担任复旦外文剧社社长，1986 年毕业时曾经是“复旦大学十大标兵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9 年 11 月以自费留学的身份来美，进入加州大学长滩分校戏剧系攻读硕士学位。1992 年进入美国“国际频道”（原 KSCI18 台）电视台工作，1994 年正式成为该台《茶余饭后》节目的制作人兼主持人。

李斌录音——

其实，我这个人的这条命是拣来的。

我小的时候因为父母支援三线，所以曾经在赣南农村住过很久。那时候我比较淘气，秋天的时候树上结出了柿子，有一次我就到别人的果园里偷柿子吃，那一次我索性就是直接坐在树上吃。那一回我吃得太多了，回家后又不敢对父母讲，第二天，我妈妈要到赣州市里去出差，我就吵着也要去，结果，上了汽车，车开了没两三个小时我就昏死过去了。

当时，我妈妈坚持要把我送到地区和市里面的大医院里去看病，不去小医院，因此车子一路没停地去了赣州。到了地方之后她抱着我下车，当时，她并不知道医院在哪里，只知道一下了公共汽车就抱着我莫名其妙地往前冲。正在她不知方向地向前冲的时候，她身后有一个吉普车跟了上来，车上的人对她说：我这是区委书记的车，我们看到你的小孩好像情况很危急，我们送你去医院吧。

我就这样被送到地区人民医院了。

我一进医院，医生就说这个小子没有救了，只能等死。医生说我得的病是一种痢疾，叫做“暴痢”，而且已经到后期了。医院把我安排在隔离病房，我妈妈和我待在一起。在隔离病房几天下来，她看到隔离病房里的很多小孩子一个个都陆续被送到太平间去了，就只剩我一个人了。这时候已经到了第四天了，那时候的我仍旧是连打针都打不进去，只有等死。这时候有一个扫地的老头看我样子挺可怜的，就问我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听完之后他就走了。一个小时之后他端回来一个小钵了，里面是中药，他要我妈硬是用筷子把我的嘴撬开来倒进去。他告诉我妈妈说：“吃了这药之后，你等个一两天，你的小孩子就会醒过来。”

过了一两天之后我真的活过来了。这时候我妈妈赶紧到处去找那个老头，但是医院方面的人说他们医院里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

这事情很玄。这件事情给我的震动非常大，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开始带着感激之心生活。所以，我现在的生活中无论遇到再大的逆境，我都能够战胜，多年来我从江西农村到上海，再从上海到美国，我心里对生活一直是充满感激的。我想我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使命就是帮助别人。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感觉。

在国内我是读外语的，我到美国来最初是读戏剧来的。我从很小起就一直对戏剧有兴趣，在复旦外文剧社的时候我就参与演出过《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等戏，当时，我认识的一个美国教授在依力诺斯州 WAYNE 大学教书，是那个学校戏剧系的系主任，他到香港出差的时候特别到上海来对我进行面试，他允诺要给我一个在美国大学里当助教的工作来支持我到美国读

书，等到我要到他的学校读书的时候，他突然告诉我他已经到加州大学长滩分校教书了，他再次允诺我要给我两个助教的工作来支持我读书。

我就这样到美国来了。

我真的觉得自己比起其他大陆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来讲实在是幸运很多。当然，在美国我也打过工，我也曾经花很多时间在打工上，我也希望从头做起。那时候我做助理教师的报酬是学费全免，然后每个月还有五百块钱生活费发给我，具体的待遇也是算是学校里教师的待遇，那时候，我有医疗保险，这份医疗保险甚至包括牙齿的保险。

在复旦，我是读英文专业的，但是到美国来之后我发现我和美国人之间还是有那么大的隔阂。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连在美国最基本的开个人支票这件事情也不会，银行的提款卡也不会用。记得我第一次到银行的提款机上去提款时就出了很多丑，当时有很多人在等着使用机器，但是我连自己提款卡的密码还要从银行的来信中查对，提款过程中所有出现的提示屏幕都需要仔细看一遍。我这边越是着急越是动作慢，而身后的队伍也越来越长，那种感觉实在不是滋味。我一直提倡中国人到美国来应该进入美国主流生活，虽然中国人到美国来之后，可以在中国人聚集的地方生活得“很中国”，但是如果那样的话，我觉得又何必到美国来呢？

我觉得，“在美国成功”的概念不是在旅美华人中成功，一定是要在主流社会里成功，或者是回过头来把两者文化结合起来的成功。

当年在到美国的飞机上的时候我绝对没有想到我会在美国做电视，其实，之所以走上这样的一条道路也是很偶然的。1994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同学告诉我洛杉矶的国际频道正在找一个配音演员兼中文翻译，我觉得自己可以试试，我就把自己的录音带寄过去应征了。我记得我当时读了一段钱钟书《围城》里面的一段话，我就被录用了。

我就是这样开始在美国做电视的。1994年稍晚的时候我面临自己研究生毕业，这个时候正好电视台调整节目，我就被通知准备开辟一个新节目。紧接着我就去试镜，试完镜之后我立即被告之说可以上节目，而且新节目下礼拜一就要上。

当时我一听都愣住了，我跑去跟我的主管说：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搞过电视的人，而且我到美国之后一直在上学，已经有四年的时间没怎么讲过中文了，现在一下子要自己上中文节目压力实在太大了。但是我的主管说：你做，或者你不做，你只有这两个选择。

我是没有选择的，不会做，就只有看别人怎么做。那时候就是这样硬上的。草草地准备过后，礼拜五就开始正式录影。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上的第一个节目是请洛杉矶懂古典诗歌的人来讲解台海两地的人在文化用词方面的差异。

这个新节目就被定名为《茶余饭后》。

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连四年在学校里都是讲英文的，到电视台来工作的时候一下子要讲回中文来，在感觉上非常别扭。因此，在工作开始之初我一直在讲话中夹带大量的英文，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毛病。这也是曾经让我最有挫折感的时候，那个时候适应过来感觉很难。我其实刚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曾经改过口音。刚来的时候，我的老师惊讶地问过我：你确定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你讲话的口音却像一个英国人。我告诉他，这是因为我在复旦的时候老师都是从英国剑桥之类的学校来的，刚来时我还不愿意把英国口音

改成美国口音。但是我现在有些后悔当初改变口音的决定，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它的美国文化界是很崇拜欧洲东西的，如果你讲英国口音的话，他们会认为你的档次不一样。

发展到今天，我的这个节目每周要采访三批人，要求来宾人数相当多，我曾经为这件事情烦恼过好长一阵子。而且我读书读得太久了，在社交场合我发现自己也不够放得开，但是这些还不是我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我所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我们的上层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美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东西并不了解，因此和他们之间就节目的细节进行沟通有很多麻烦。比如说我如果要申请拍一个外景之类的，常常就得和主管进行很多沟通，有很多的阻碍在其。

我一直在说，在到美国来的飞机上我绝对没有想到自己会上美国的电视，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三等残废”，这可能是因为我哥哥从小到大就比我长得英俊得多的缘故，他实在是非常潇洒，所以我一直有对自己相貌的心理障碍。想不到我有一天开始做电视而他却搞生意去了。

在美国做电视之后我觉得这一行真的是会让人着迷和上瘾的，能够学到非常多东西。我原则上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的东西，我对各种人都怀有一种好奇心，我都想去了解。对于我从事的工作来说，具有这种心理多少是一种优势。

我做节目是有固定预算的，我自己负责支配这个节目所有方面的开支，除了我自己是向电视台领薪水的，其他都要在预算中开钱。当然，这么久以来我们完全是低消耗地使用这些预算，几千个美金就可以做整整一个月的节目，这在美国主流媒体或者是中国大陆都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办事的。在整个节目制作过程中，我要自己去雇导播、化妆师、音乐师和摄影师等等所有技术人员。我相信，在美国华人电视圈中，我们的技术人员是最好的，因为他们全部都是在美国主流的大电视台工作的技术人员。在节目实际制作中，我们采用的是一次性录相，一次性同时剪接上带子，这种作法可以抢时间，当然也可以大大地节约成本。

请这些美国主流社会的技术人员来工作代价是不低的，他们一次最少要从四个小时起付。美国的技术工人的工资非常贵，一般来说都是一小时 45 块钱左右。而我这个名义上的制作人，却成了一个工友性质的人，反正是所有琐事，从出去联系客人起，到外出拍东西，再到回来剪辑，面面俱到地都要管起来，最早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每次在实录之前要准备各种带子，希望最多地多配进一些画面去。实录那天，在技术人员和被采访对象到来之前，我要自己准备一些花，这都是要自己去外面订购，我们一个星期只录一天的像，因此，这一天的时间就会很紧张，我们每周要采访当周的地区三个热点人物，像打仗一样，一个点上耽搁了的话，后面所有的事情都会一同被耽搁。机器前你看到的我是在笑着主持节目，实际上我的脑子里一直紧张地在想下面一个节目的事情，甚至具体到镜头应该怎么样取。

但是，我知道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这么几年下来，我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是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我有的同学就曾经对我讲：“你一年在电视台里学到的东西我用了四年学习和一年实习还学不到。”他们赞叹说我的位置说我“划算”。的确，现在的我，从摄影开始到剪辑、制作，再到主持，我样样都已经学会了。

我因为工作的关系能够接触到很多不同类型的被采访者，这些人物牵涉的事情层面之广可以套用中国的一个老对联，叫做“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发现我除了从制作节目中学到了东西之外，从客人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这就好像当年我在复旦毕业后留校教书的时候，那时候我虽然身在讲台上给学生们上课，但是我知道，我的学生们教给我的东西远比我给他们的东西多得多。比如说我们曾经访问过香港一个选美出身的演员翁红，采访之前我一直认为，单凭她的身世背景来讲，她一定是一个没甚么东西的女孩子，但是一谈下来发觉这个小女孩还是很有点个性的。以前，我看人总是会先带一个自定的框框，现在，多年的工作经验累计起来，我看人会比较客观。

这么些年下来，我采访过的人物前前后后加起来也将近五百号人了，而《茶余饭后》节目我们也已经做到三百多集了，其中的名人很多，陈冲、贝聿明、马友友、林昭亮、丁绍光等很多人都曾做过我们的嘉宾，甚至于轰动全球的OJ辛普森杀妻案中处理尸体检查的华裔法医。在美国主流人士方面我们采访过老“007”维杰莫尔、导演理查德戴维斯，这个导演80年代的一部名叫《替身》的片子非常有名。我注重在我这个以中国人为主要观众的节目里让美国主流社会的人物占我访谈客人中的十分之一。但是采访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那就是会加大我们的工作量，访问的时候是可以英语的，但是我们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就必须给访谈内容打中文字幕，这很费事。

我从自己走过来的路深深认识到，一个电视节目反应的就是一个制作人的品位，制作人是怎么样的，节目出来就会是怎么样的。到美国来之后，我一直认为要融入主流社会中去，因此我有意识地要把美国主流社会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社区，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对生活的地方一点也不了解，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名人，尤其是中国只要是路过南加州的名人，我们基本上都会“抓住”他们。我每周通过很多途径来得到各种人才的消息，我也有选择性地介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社交场所，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对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消息，尤其是影视消息，我都是直接和电影厂联系的，一般美国大的电影厂大都有自己的新电影发布资料，他们在电影上映之前是非常愿意把剪辑过的新电影内容寄给各电视台的，你看过之后如果有兴趣就可以打电话要求采访，电影厂方面就会给你安排。这种事情一般来说是在电影首映前的两个星期就开始做，他们安排所有媒体的人排队，一个个地采访过来，这些活动是免费的。关键的一点是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当然，这也是一个制作人应该具备的素质。我每周是周五开始录相，周四开始做准备，每周前三天的时候就这样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这么多年来，我收到过很多观众的感谢信，也有很多观众打电话来给我们，告诉我我们的节目对他们的生活影响有多大，这些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心理责任很重。平常的时候我们每个月会收到两三百个电话，多的时候，有一天之内就曾经收到过五百多封信。我们是全美播出的节目，有的时候关岛和南美洲的观众也会给我们写信，有的电话甚至是从“贝利斯”这种我在地图上找也找不到的地方打来的。有时我们做入籍美国方面的节目，更是备受注目，移民局的主讲人下了节目之后还会接听两个小时的电话。有一次我们做过一个节目是讲在美国进行投资移民问题的，当时我已经注意到被采访者提到他们公司只要客人备足十二万五千美金就可以帮助客人办理投资移民，这个问题其实相当富有争议性，是真是假还不知道，因此我请来了另外一个

也是搞移民的律师在节目上与最先选定的采访者展开辩论，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中立的结果。结果节目下来之后就有观众打电话来要那个搞投资移民律师的电话，我当时告诉观众说，我制作这个节目并不是在替任何人做广告，但是观众说：“他们能够上你们的节目一定就是不错的。”从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觉得我们这个职业实在是很重要，我注意到美国进入电视时代之后，观众对电视有一种莫名的信任，这也许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自己的位置很重要，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不能误导观众。

我常常也会和美国大电视台的制作人一起聊天，我发现他们在节目之外所进行的准备的功夫十分详细，很多看上去是信手拈来的东西其实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你如果仔细看他们片子结尾的制作名单的话，你会看到参与编辑、撰稿之类事务的制作者非常多。我也曾经和国内的同行聊过，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分工细多了。因此，我也一直很想回中国大陆看看。当然，如果说做我们这一行有什么不好的话，那就是我自己的时间太少，每天都会是匆匆忙忙的，左冲右突的，没有一个整个的时间让我静下来思索自己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很想自己给自己一个时间，让自己静下来。

我觉得这行业很有意思，每天都可以有无限的想象空间。未来我希望能够做一些新闻杂志性的东西，制作美国著名的《六十分钟》、《20/20》、《赖瑞金访谈》类型的这些深入报导节目都是我的梦想，我更希望的是能制作全球联线的节目，让所有有华人地区都能够看到。去年的时候我的这项梦想几乎就要搞起来了，但是预算报上去之后因为金额太高没有被批准。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我们台目前已经和中国的中央电视台联合搞了一个完全华语的频道，有这么多外来节目的冲击，这对我们自己的节目也是一个挑战。

当年我出国的时候，所有的目标就是想读一个法学博士学位，现在我已经硕士毕业之后开始做电视了，但是我相信我未来还是会把我的法学博士学位计划完成，这样我的思维方式会更严密一些。

自然，这也能和做电视殊途同归。

我想致力于此。

陈燕妮思绪

他在自己位于好莱坞附近的办公室使用的电话留言机上一直是这样一句：“你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和要求，请留言。”聊天的时候就此曾经取笑他，但是看到他笑得非常勉强，心里立即觉得根不应该。

他的认真，让人印象良深。很多在美国的新闻人都说：他是一个绝对的好同行，平和，不嫉妒，不张狂，不说别人的坏话。

我个人也上过他的节目，当然也是在一个星期五被叫到他的制作间。进到他的电视台内，满眼都是黄毛蓝眼，走道竟也是七扭八拐，左冲右突。他的节目制作间用的是一个小房，但是很出名，虽说是台里的小节目，但是轻轻地一问，谁都知道。英文里，他的节目叫做“TEATIME”

这个节目制作起来果真也是“主流”技术人的天下，先就是黑女人来为你化妆着彩，再然后是白女人要你脖子上的项链摘下来以免直接和微型麦克风产生磨擦。再然后，白男人一声“开始”，李斌和他美丽的拍档、原四川电视台的主播卓蕾立即连连发问不已。

中国国内的电视界常常就有镜头不够，访谈人物重复，一个题材做过之后因为相对没有新现象，就得又不得不从头再来的窘况，在美国这种人家的

地方、人家的人文环境之下做电视，就更加有这方面的难受，制肘更多。社区小、人物少首先就是一个短处，更何况这里的读者已经看尽台、港、中国大陆等地陆续而来的各种精英节目，眼光挑剔，因此，制作节目时，无论选材还是过程都有不少现实之下无从更改的高要求。如何做得次次不雷同，但是又能保持清新的感觉，对任何一个制作人来说都是一个大考验。李斌不错。

熟悉他的人，就时时感觉得到他的挖空心思。

和他谈话，他就常走思，感觉到他已经离开你，轻快地回到制作间。

罗 赛

罗赛背景

1976 年在北京部队二十四军文工团当文艺兵，1979 年复员回到家乡杭州市，后被分配进杭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担任女侦察员，从事指纹鉴定方面的技术工作。与此同时，其开始参加浙江省内的各种文艺活动。1984 年因为负责讲解公安局“严打”展览被浙江省电视台导演看中，从此进入浙江省播音界。

1984 年 7 月正式调入浙江省电视台，历任新闻主播、专题节目主持人等职位。作品《鲁迅故乡乌篷船》专题节目曾获中国首届“如意杯”全国电视节目最佳主持人奖，其与他人合作及自己独立制作的其它专题和新闻节目也曾获得全国电视评选优秀作品一等奖等奖项，其撰写的专业论文《节目主持人的场效应》曾获中国播音学理事会年度二等奖。

1991 年以陪读身份赴美，后进入美国中文电视台担任新闻记者及新闻主播至今，期间曾多次代表美国中文电视台与中国各省市电视台联合制作节目。

罗赛录音——

我清楚地记得，1984 年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那天，浙江省电视台的电视新闻是由我播出的，那次是我第一次上屏幕。当时的我已经在杭州市公安局于女侦察员整整五年了，那天因为我跑到电视台里去播音，我们局长还老大不高兴了一阵子，说是“一个女侦察员不应该干这种事情。”

那个“五一”过后的两个月，我就正式被调入浙江省电视台工作了。从那以后，我一直干到今天的电视主播生涯宣告开始。

在中国的播音界，我想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一进到电视台里就做专题和文艺节目。那时候，也就是从 1984 到 1985 年之间，我记得浙江电视台某天的节目中曾经出现过从新闻到专题都是由我一个人来主持的。当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观众比较喜欢新鲜面孔；二是那一段时间里浙江播音界青黄不接，台里也确实拿不出经过训练的人顶替上来，我就这么一个人单打独斗地开始干播音这行。1988 年我离开新闻部，调入文艺部工作。在文艺部里，我的大部分工作是搞文艺晚会，再后来我又转入专题部，主要负责搞一个社会性的专题讨论综合节目《众安桥》，这个节目推出之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重视和好评。我也因此在浙江一带很出名。

在那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真的很厌倦街上人人都认识你的这种生活，这种生活迫使你即使是去菜场买菜也要把自己伪装起来，这给我带来很多烦恼。在国内，不是说大家都认识你你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了，事实上你虽然已经成为一个名人，但是你拿的还是普通人的工资，但别人不管这些，还是会有很多人因为认识你而可以在你身后品头论足。久了，我真的很讨厌这种日子。

1991 年底我决定到美国来。

当时，我丈夫是公派留学生，他是搞美术的，是公派留学生，我是以他的陪读家属身份到美国的。事实上，我丈夫当年在国内的职务是讲师，国内不允许他这样的人自费出国，所以他只好就以公派的名义出国，但是所有和国外的联系事宜和出国费用全都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现在想起来我必须承认当年我出国时，对自己出国的目的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想法，只是觉得自己从 1984 年到 1991 年已经在国内的电视界呆够八年